DOI:10.16142/j.cnki.gmrxk.2001.03.005

追慕与疏离

——论郭沫若与屈原

吴定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最受郭沫若爱戴的诗人是屈原;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受屈原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郭沫若一生的作为,努力追步屈原精神;郭沫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不懈地与那些否定屈原存在和抹杀屈原精神的论调作斗争,包括他的"太老师"在内。郭沫若对屈原出生年代、文学创作、文学成就及思想形成渊源的研究结论,很多仍为今天所接受。

关键词: 屈原　文学创作　爱国主义　追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3-0029-09

一、追步屈原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最受郭沫若爱戴的诗人是屈原;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受屈原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

屈原出身于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世家,任过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等官职。他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由于受到朝廷中奸佞小人的排挤、中伤、诬陷、被逐出都城,流放外地。在长期的流放中,他没有一刻不心忧国事,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最后,他怀着壮志难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自投汨罗江中,以表明忠贞爱国的心迹。屈原的学识极其渊博,才华横溢。众所周知,先屈原两百年结集的《诗经》,是北方诗歌总集,《国风》中没有《楚风》。屈原扎根于荆楚文化土壤,从楚民族的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又学习和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 25 篇代表南方文学特色的作品。屈原的诗歌不仅浸透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而且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诗经》中的赋、比、兴的手法推向新的高度;同时在诗体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局,句子字数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创造了"骚体"诗的形式,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屈原开拓了一代新诗风,开启了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先河,奠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人格和光辉灿烂的文学成就,两千多年来照耀着无数的后世诗人。正如鲁迅所说: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1]郭沫若一生热爱屈原、学习屈原,研究屈原,在作品中表现屈原。他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2]并在诗中怀着崇敬和惋

收稿日期: 2000-12-15

作者简介: 吴定宇(1944-),男,广东人,广东省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中山大学学报》主编。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惜的心情吟叹道："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3]考察郭沫若生平，他读屈原的作品是在进入中学的时候。他读《史记》时，《史记》中的《屈原列传》"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4]显然，屈原的身世遭遇、思想情操及其所创作的《楚辞》，在他的心灵中激发起强烈的共鸣。他对屈原情有独钟，自1920年底写出以屈原行吟泽畔为题材的诗剧《湘累》之后，历年来又创作出歌吟屈原的诗作30多首。抗战时期所推出的历史剧《屈原》上演时曾轰动了山城重庆。郭沫若在艺术创作上成功地塑造出了屈原的形象，凸现了屈原精神，得力于他对《楚辞》的透彻理解和对屈原的深刻研究。在他的文学活动与学术研究中，不仅将屈原的《离骚》等25首作品全部译成白话文，而且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写出了《屈原时代》《屈原考》《屈原研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20多篇研究文章，在学术领域主研究屈原的一家之言。

郭沫若与屈原所生活的年代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呼唤伟大诗人并且能够造就伟大诗人的社会转型时代。屈原在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使郭沫若产生联想，屈原的高洁人格品行，为郭沫若树立起学习的好榜样；屈原的作品，也是郭沫若取之不竭的宝藏。难怪郭沫若以现代"屈原"自况，"我委实自比过屈原。"[5]那么，郭沫若怎样继承和发扬光大屈原精神的呢？

首先，郭沫若和屈原都是在气质上偏于主观，在性格上酷爱自由，在感情上狂放不羁的诗人，因此，郭沫若很自然地受到屈原个性意识的濡染。当然，屈原的个性意识主要表现为在"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6]的艰难环境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气节情操，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特立独行，孤高傲岸，驰骋想象，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与污浊的现实进行顽强的抗争。无庸赘述，屈原的个性意识同现代的个性主义还有着较大的差异。然而，自西汉以来，儒家文化取得了正统地位，屈原的个性意识的某些方面由于不符合儒家的伦理训条而遭到一些儒家学者的批评。西汉的扬雄是最早对屈原人格有微辞的文学家之一。扬雄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咸之所遗"，[7]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8]东汉辞赋家班固以儒家"明哲保身"的价值尺度，贬斥屈原"露才扬己""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9]南朝齐梁时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也数落屈原是"狷狭之志也。"[10]南宋的朱熹更是不以为然地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11]但是更多的历代文学家都景仰屈原的个性和人格。且不说西汉的文学家贾谊自比过屈原，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把屈原与周文王、孔子、左丘明等圣贤并列，就是郭沫若一向推崇的李白，也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12]由此看来，从西汉开始，历代读书人对屈原的个性意识的评价虽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屈原的个性意识也为一些文学家所继承，成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内核之一。五四时期，郭沫若用刚接受的西方个性主义来诠释沉积在自己文化心理的屈原的个性意识，形成了他所独具的个性解放思想，构成了《女神》强有力的音符。诗剧《湘累》取材于屈原被放逐泽畔的一个生活片断，郭沫若力破前人抨击屈原"露才扬己""狂狷景行""不可以为法"的陈腔，塑造了一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13]的孤独放任、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屈原形象。他说他写《湘累》"实际上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14]他借屈原之口抨击"见了凤凰要说是鸡，见了麒麟要说是马"的"这个混浊的世界"，表达出"自我表现"和"自由创造"的激情。

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电，我革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于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

如果说《湘累》中的屈原是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的话，那么《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浴海》等诗，则以磅礴的气势，汪洋恣肆的激情，狂放的笔调，颂扬了自我的力量，体现了沉积在郭沫若文化心理中的屈原式的个性意识的发扬光大与升华。

其次，郭沫若自幼深受儒家"内圣外王"人格设计的熏陶，一方面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心性的净化、升华，讲求志行高洁与气节情操；另一方面追求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以期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5]的终极目标。辛亥革命之后的十几年，国内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攻城陷野、争斗不休；外国列强又虎视鹰瞵，垂涎我国领土。到了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妄图吞并我国的侵略战争；蒋介石政府接连掀起三次反对共产党的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形势上与战国时代的局面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6]渴望以自己的才干辅佐贤王统一天下的屈原，又成为郭沫若的楷模。他继承了屈原强烈的入世精神，在少年时代就如同屈原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7]寻找一条改造中华的道路。他到日本学医，"这也是从'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思想出发的。"[18]后来，弃医就文是因为他"认识到文学对革命还是能起鼓舞推动作用的，就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睡狮。"[19]所以《女神》回旋着"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旋律，抒发出诗人"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的兼善天下的抱负。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由于在现实社会中处处碰壁，又感到文学搞不通，不能实现他在《女神》中表露的"救彼苍生起"的宏图大志。强烈的入世精神转化为政治参与意识，驱使他选择了屈原所开创的诗人从政的道路。他密切注视着变幻的时代风云，积极参与政治斗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在北伐和抗战期间，他两次从戎的行动，便是这种政治参与意识的具体体现。1926年8月25日，他在北伐途中行经汨罗江时，赋诗凭吊屈原：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虽有三户，怀石理则那。[20]

诗中洋溢着他初次从军的豪气和"揽辔忧天下"的入世精神，表达出对屈原怀石投江的惋惜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政治更加热心，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以致他后来所写的许多诗歌、杂文、随感、历史剧和史学论著，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屈原一样，郭沫若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特别坚定，对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格外执着。他的政治活动虽然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因为参加过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章而被蒋介石政府通缉，不得不长期流亡日本，但他"虽九死其犹未悔"，[21]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未改变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从未降低自己参与政治斗争的热情。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潜回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旺盛的热情组织和团结正直的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反对政治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此时，在他心目中"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22]在他所写的历史剧《屈原》和一系列研究屈原的文章中，他不是从单纯的文学或单纯的史学角度，而更多地是从政治的方位，把屈原当作"南国的圣人""楚国的柱石""革命诗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来颂扬，从屈原的入世精神中吸取鼓舞自己站在时代前列的力量。这就使得他成为反侵略、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的斗士和继鲁迅之后文化界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又一面旗帜。

需要指出的是，屈原入世精神的核心是坚持对国家大事进行独立思考，从不变心从俗；揭露斥责身居高位的群小违法乱纪，把国家引向灭亡的罪行。1949年以后，郭沫若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等领导职务。无庸置疑，郭沫若在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对外交往活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文化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出于对领袖的热爱与崇敬，同时也消极地接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对于领袖的言论和治国方略，他是无条件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甚至对于领袖的某些失误，他也一味加以赞扬。有时为了迎合领袖的心意和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惜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1949年后他虽然多次赞扬屈原，但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已使他淡化和疏离了屈原式的入世精神与人格，逐渐走向世俗。

再次，屈原的爱国情操，奠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战国时代的七雄纷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当时各国为了争夺天下，无不求贤若渴，招揽人才。游说之士如择枝而栖的良禽奔波于各国之间，寻求能施展自己才干的地方。公孙鞅由卫入秦，吴起由卫至鲁，再至魏，又去魏入楚，本是邹人的孟子而求仕于齐，本是赵人的荀子到楚、齐、秦等国谋求发展，原来是韩国公子的韩非到秦国劝秦灭六国，正如郭沫若所说："当时的学者们是志在天下而不在一国"。[23]所以，屈原虽被怀王疏远，遭襄王放逐，自己蒙冤受屈，颠沛流离，却因太爱楚国，不肯到别国去另寻政治出路，并在作品中一再抒发这种如司马迁所说的"眷顾楚国"[24]的深情。

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25]

望长椒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蝉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臻。[26]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27]

类似这样的诗句，还可以从屈原赋中找出许多。屈原对乡国的苦恋，不仅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而且也激励着无数的后世之人。无庸讳言，屈原不去他国，固然有希望楚王回心转意召他回朝以实施"美政"政治抱负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热爱楚国的人民，念念不忘为人民解脱苦难，不愿离开楚国老百姓远走他邦：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8]

然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29]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30]

屈原用心血写就的爱国诗篇，滋育着郭沫若成长，是形成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股源头活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和流亡长达20多年，并且在日本组织了一个家庭，然而他深深地思念着、眷恋着祖国和人民，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命运。不必细说《女神》中的《凤凰涅槃》《晨安》《炉中煤》等诗篇充盈着的屈原式的爱国情思，也不用再多费笔墨论述这部诗集中《棠棣之花》《地球，我的母亲》《雷峰塔下》等诗篇所流溢着的热爱人民大众的感情，就以郭沫若在"芦沟桥事变"后"别妇抛雏"，冒死从日本潜回祖国的行动而议，就足以看出在他对祖国之爱是何等深切，他在《归国杂吟》中吟咏道："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31]。表明这次归来报效祖国，显然是受到屈原爱国情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说：

屈原是永远值得崇拜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32]

抗战期间，他在题傅抱石所画《屈子行吟图》的诗中，又一次赞扬屈原的爱国情操："中国不会亡，屈子芳无比"。[33]写完这首诗后，郭沫若意犹未尽，又在《题画论》中强调："屈原在一千多年前为我们斗争了来，我们是永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继着他的意识在猛烈地作着斗争的。”[34]确实，郭沫若归国请缨，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以忘我的热情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他在40年代所写的《屈原》等六部历史剧，都融注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显示出他不但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而且还用这种精神激励人民大众去反对外来侵略者和国内独裁者的专制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自身的解放。

二、释疑存真

屈原圣洁的品格和志行及其所创作的可歌可泣的诗篇，可与日月争光，对铸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对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极其珍贵的遗产。为了真正理解和把握屈原精神，使其重放光华，鼓舞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反抗法西斯专政和维护正义、争取民主而斗争，郭沫若自30年代中期开始，以空前的热忱从事屈原和楚辞研究。1949年以后，郭沫若虽然身居高位，但深入探讨楚辞和进一步阐发屈原精神，仍然是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学术研究课题。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屈原研究中独辟蹊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屈原的存在，是历史的真实。这在西汉贾谊所写的“吊屈原赋”、刘安的《离骚传》和司马迁所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著述中得到有力的证实。两千多年来，尽管人们对屈原的是非曲直褒贬不一，但基本上听不到否定屈原存在的论调。只是到了20世纪初，四川经学大师廖季平在《楚辞讲义》中首先提出“《屈原列传》多驳文，不可通，后人删补非原文。”并且根本否定屈原的著作权：“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予则以为秦博士作。”既然是秦博士作，那么为什么又署上屈原的名字呢？廖季平解释道：“汉人恶其出于秦，乃以有屈子名，遂归之屈，其实不然。”[35]20年代初胡适《读〈楚辞〉》中又提出“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立论的依据是“《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传说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胡适进而断言，“《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他认为《楚辞》的前25篇，除《离骚》和《九章》中的一部分外，其它大部分诗篇均非屈原所作。并按时间先后列了一个表：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九歌》

(2)稍晚——屈原？《离骚》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4)稍后——楚亡后　《卜居》

《渔父》

(5)汉人作的《大招》《远游》

《九章》的一部分　《天问》

胡适斩钉截铁地断言：“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36]廖季平、胡适的看法虽然没有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但否定屈原存在和屈原著作权的文章不时在学坛上出现。例如在1938年，卫聚贤、何天行在《〈楚辞〉新考》中宣称不但“完全赞同胡适的主张”，而且还要“对于胡适的主张加以具体的补充和扩大”，论证“《楚辞》作于汉代”，“刘安是《离骚》的作者。”[37]又如在1944年的“诗人节”(端午节)纪念会上，孙次舟教授讲述屈原事迹时发表怪论：“屈原纯系一宫廷文人，而且是汉时东方朔之类的弄臣，”[38]次后又撰文发挥其“屈原是文学弄臣”[39]的观点。到了50年代，朱东润教授又连续发表《离骚底作者》《离骚以外的屈赋》等4篇文章，重弹30年代卫聚贤和何天行的论调，再次否定屈原对《离骚》等25篇作品的著权。

显而易见，倘若不把屈原及其作品的存在问题弄清楚，那么屈原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不仅对《楚辞》的探讨无从深入下去，而且还会对后来的《楚辞》学研究布下迷雾。郭沫若当然不会沉默。30年代他还在日本流亡时，就写出《屈原》和《屈原时代》等文章，阐发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回国后又于1942年写出了《屈原研究》，通过自己用严谨的求实态度和科学方法对《楚辞》《史记》等古代典籍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辨伪，训诂、释证、批驳了廖季平和胡适等人的"屈原否定论"。饶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少年时代曾师从帅平均、黄经华先生学习经学，得益匪浅。而帅、黄两位先生又是廖季平的高足，因此，按中国传统的说法，郭沫若应该是廖季平的再传弟子。他虽然尊敬廖季平，但更执着追求真知灼见。廖、胡的说法，直接牵涉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因为照郭沫若看来，"在屈原死后的两千年，无论何时何代的中国人，都是在他的伟大影响之下，都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40]所以，他敢于与"太老师"争鸣。首先，他运用广博的上古文化知识对《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进行考释，指出"中国古代好些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共同的。秦的祖先是高阳氏，楚的祖先也是高阳氏……所以廖先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专指秦的祖先实不可靠"，[41]廖季平把这句看作是"秦始皇的自序"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其次，针对廖季平所提出"《离骚》并不是屈原作品，而是秦始皇时方士所拟的《仙真人诗》"。[42]另一主要依据"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他指出"始皇名政，别人一定要避讳，政与正同音，秦正月已改为端月，何物方士敢撄此暴君之威！所以廖先生说：'名余曰正则兮'是点出始皇的名讳也不可靠。"再次，他通过文体、民族气质，地理风土的比较，以《离骚》的文辞是六字为句，"秦始皇时所做的一些有名的韵文，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海上议》《芝罘东观铭》《芝罘观铭》《刻碣石辞》《会稽刻石》《峄山刻石》等，却都是以四字为句"，而且这些刻石辞如《诗经》中的《秦风》，秦襄公时的《石鼓文》，文字质实，"和《楚辞》的气韵格调完全不同"。[43]从而断定"象《楚辞》这样的作品，在秦代文学中找不到，在古代北方文学中也找不到，这在断定《离骚》为秦方士的《仙真人诗》上，是坚决的反证。"[44]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离骚》是屈原作的，断无可疑。"[45]

对于胡适在《读〈楚辞〉》中所提出"屈原是谁？"的疑问，郭沫若认为"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46]他以翔实的材料和确凿的考证，逐一予以驳难。胡适所说"《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的论据之一，是因为此传末尾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47]郭沫若指出这段话"早就有人说过是'后人所增'，而那增窜过的文字也还有传讹。'孝文崩'应该是'孝景崩'的错误。"[49]接着他又指出胡适对《屈原贾生列传》所提出的"大可疑"，"也疑得不周到。"胡适说，屈原"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49]郭沫若以现实生活的现象破疑，"我们如想到现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发抒伟论的近事，便可以不费笔墨的得到了解。"[50]胡适又说：《屈原传》忽说屈原"'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51]郭沫若的解释是："'放流'两个字当成流谪解，是后来的人讲错了的。其实'放流'就等于'放浪'，并不是屈原在楚怀王时便遭到过流刑。"[52]胡适认为第三大可疑是《屈原传》中有"'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53]郭沫若说："那两句话，本来是很平常的话，昭睢可以说，屈原也可以说，就如现在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一样，那是毫不足怪的"。[54]胡适的第四疑问是"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还是黔中呢？"[55]郭沫若以揶揄的口气消解疑云："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王22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56]对胡适的第五大可疑，为什么《屈原传》"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57]郭沫若则运用训诂学的知识进行考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释，指出这更不能成为疑问，“因为‘屈原者名平’，司马迁在开首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称平称原本是两可”，而且“高平曰原’见《尔雅》，‘上平曰原’见《公羊》昭元年传，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训的，不能够说司马迁是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58]至此，经过郭沫若逐条论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59]

消解胡适所提出的五大疑问，只是弄清楚屈原是谁的问题的第一步。郭沫若以考古学、考据学、训诂学、历史学和文学等方法对屈原的存在及其事迹作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在司马迁之前的贾谊作有摹仿《离骚》的《吊屈原赋》，赋中又明明说：

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

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由此，他从正面论证“屈原在贾谊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贾谊离屈原仅百余年，所寄寓的地方又是长沙，曾经亲眼见过屈原的故老是有存在的可能的，关于屈原的遗说不用说是还十分新鲜。”同时他又反证：“《楚辞》里的《卜居》《渔父》两篇虽由近人的研究判定它们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那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60]不仅如此，他还根据《离骚》中的诗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从历法中算出屈原诞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又根据《九章·哀郢》的内容，推算出屈原自投汨罗江的时间是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5月5日。”[61]郭沫若关于屈原生卒年月日的考证，至今仍为学术界所认同。于是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定下铁案：“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的人物。”[62]

关于屈原著作权的争论，则从40年代持续到50年代初。在《屈原研究》中，郭沫若悉心对《楚辞》中相传是屈原所作的25篇作品进行了考证、辨伪和评析。首先他通过对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和《报任少卿书》的比较分析，确认《离骚》为屈原被顷襄王真正放逐后所作，“是屈原晚期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63]其次，他力驳胡适最早提出，又为当时一些学人所继承和扩充的观点“《九歌》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64]从《九歌》中的《河伯》一篇应是战国时代作品而断定”和它格律相同的其它十篇也必然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进而又指出“《九歌》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时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后”。[65]他还认定《天问》《九章》《招魂》也是屈原的作品。再次，他以科学的精神，同意陆侃如、游国恩的看法，《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的作品。郭沫若对屈原的作品作了一番认真的审视之后，把它们的创作时间大致分为三期：

第一期　《橘颂》《九歌》《招魂》；

第二期　《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

第三期　《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66]

尽管学术界对这种分法是否恰当尚有争议，但几乎都承认上述篇章是屈原的作品。朱东润先生在50年代初所提出的《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九歌》“大致作于汉武帝时或其后”，《九章》中“《涉江》《哀郢》两篇很可能是淮南王安底遗臣经过天狩五年全民大迁徙的产物”“《橘颂》这一篇的作者可能是楚人，也可能是淮南人”，“《天问》这一篇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67]等否定屈原著作权的观点，受到郭沫若所写的《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等文章的批评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他所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不但确认《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篇是屈原的作品，承认“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骚体’的创始者”，而且在介绍屈原的生卒年时，也采纳了郭沫若的推算。[68]

三、解读屈原

在肯定屈原的存在及其对作品的著作权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同时，郭沫若从文化的方位对屈原的思想、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创建良多。

首先，郭沫若从对殷、周文化的比较中探讨屈原思想的渊源。“中国的真实的文化期起源于殷代”，“周人是文化比较低的民族，他把殷灭了，把殷的文化继承着”[69]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殷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亡以后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周人继承，在北方有损益地加以发展；一支由殷的直系后代宋人和殷的同盟国徐人与楚人在南方传播，发展，在春秋以前就已形成高程度的南方文化。殷人最为迷信，周人则对天神表示怀疑；周灭殷之后，逐渐用尚礼取代殷人尚神的风气，成为中国北方文化的一大特色，而殷人崇神信巫的风尚，便在南方文化中保存下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嬗变。社会的变革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屈原生活在战国的后半期，那时北方文化中的儒、道、墨学派已成为显学，并寖寖向南方文化渗透。据郭沫若考证，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70]自然深受南方文化的主体——荆楚文化的熏陶，但南北文化的交融，使屈原接受了北方文化的影响。历代的学人早已指出屈原思想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但屈原如何接受儒家文化，向谁学习儒家文化，由于《屈原贾生列传》等古代典籍未有记载，便成为屈原研究中的一大悬案。郭沫若独具只眼，对《孟子》上的一段话进行考证：“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71]陈良是有弟子的，陈相、陈辛兄弟便是其门徒，事之数十年”。郭沫若据此推断，陈良“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一定不少的。以年代而言，屈原就应该出于他的门下。屈原的思想纯是儒家思想，他在南方必得有所承受。”[72]应当说这个推断是很有道理的，对揭示屈原思想的渊源，不无积极意义。

其次，郭沫若从“以人民为本位”出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去审视，评析屈原精神，他注意到随着奴隶制的逐渐解体，人的价值在不断提高，伦理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仁是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郭沫若对仁下的定义是“把人当成人，便是所谓仁。”在屈原作品中，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的诗句俯拾皆是。在40年代，郭沫若认为屈原“是位民本主义者”，“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到了50年代，他对屈原的了解又增进了一层，提出了“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的观点。当然，屈原热爱人民，也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楚王能采纳自己的“美政”政治主张，承继唐虞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辅佐下统一中国。所以郭沫若说屈原“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他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76]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在郭沫若看来，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热爱正义，既是屈原精神在其作品中的表现，又是“使他能够有伟大成就的基本原因。”[77]还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纪念着他的根由之所在。郭沫若对屈原精神的阐扬，把40年代孙次舟等人宣扬屈原是“文化奴隶”“文学弄臣”的观点的余波彻彻底底地平息下去。

再次，郭沫若对屈原的艺术创作经验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中肯的阐发。他在许多文章中对屈原向荆楚民间文化学习，采用民间歌谣和大量使用方言口语的作法大加肯定。例如他对屈原最喜欢用的“兮”字及其所采用的24个楚方言进行考释，把屈原作品同周人的台阁体《诰》《命》《雅》《颂》作了比较，高度评价屈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 他彻底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来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体。他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他的文学革命真是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实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
>
> 他是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

中国古代诗歌，经由他的手卷起了一番大革命，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卷起了一番大革命。是屈原把明显的人民意识灌进诗里，是屈原采用了民间形式，把古代僵化了的贵族诗歌平民化，获得了饱满而横溢的新生命。[80]

屈原学习和吸收楚声形式，开拓了骚体诗创作的广阔天地，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了两千多年，郭沫若无论怎样评价屈原在这方面的贡献都不过分。屈原惊人的想象力也使郭沫若赞叹不已：“屈原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步的。”[81]《离骚》《九歌》《招魂》自不必说了，就以《天问》而论，他认为“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82]“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奇特、最有价值的好文章。”[83]他驳斥胡适，《天问》“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84]不仅如此，郭沫若还从诗人的角度总结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是“感情的真挚、构思的奇特、气魄的雄浑、词藻的丰富、韵调的铿锵、形式的自由”，[85]这种看法，切中肯綮。对于屈原精神以及屈原作品的文化价值，郭沫若也有明确的认识：

由楚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就没有毁灭的一天。[86]

综上所述，屈原是中国诗歌之父，他的人格和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座丰碑，感召和哺育了贾谊、司马迁、张衡、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苏轼、陆游、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黄遵宪等历代诗人。屈原也在郭沫若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郭沫若愈研究屈原，愈了解屈原，就愈热爱屈原，愈崇敬屈原，心灵与屈原不无相通之处，在文化性格、文学创作上同屈原有着血缘关系。郭沫若也曾追随屈原的足迹，力图在20世纪弘扬屈原精神，继承和发扬《楚辞》的艺术传统，承先启后，不但开辟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在屈原研究方面，也成一家之言，成为造诣很深的《楚辞》专家。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郭沫若．屈原·序[A]．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8.

[3][33][34]郭沫若．题画记[A]．沫若文集第12卷[M].

[4]郭沫若．我的童年[A]．沫若文集第6卷[M].

[5]郭沫若．创造十年[A]．沫若文集第7卷[M].

[6]屈原．怀沙[A].

[7]扬雄．反离骚[A].

[8]扬雄．法言[M].

[9]班固．离骚·序[A].

[10]刘勰．文心雕龙·辨骚[A].

[11]朱熹．楚辞集注[M].

[12]李白．赠别郑判官[A].

[13]屈原．渔父[A].

[14]郭沫若．创造十年[A]．沫若文集第7卷[M].

[15]论语·雍也[M].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6][24]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M].
[17]屈原．离骚[A].
[18][19]郭沫若答青年问[J]. 文学知识,1959,(5).
[20]郭沫若．北伐途次[A]. 沫若文集第8卷[M].
[21][25][28][29]屈原．离骚[A].
[22][76][77][78]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A]. 沫若文集第17卷[M].
[23][44][46][47][49][51][53][55][57][59][60][61][62][64][66][67][70][71][74][75][78][80][82][84][86]郭沫若．屈原研究[A]. 历史人物[M].
[26][27]屈原．哀郢[A].
[30]屈原．抽思[A].
[31]郭沫若．归国杂吟[A]. 沫若文集第2卷[M].
[32]郭沫若．关于屈原[A]. 沫若文集第12卷[M].
[35]黄中模．论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功绩[A]. 郭沫若研究(第四辑)[M].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36][48][50][52][54][56][58][65]胡适．读《楚辞》[A]. 胡适文存第2集第1卷[M]. 上海亚东书局,1932.
[37]楚辞研究[M].
[38]锦城诗人节[N]. 新民报晚刊,1944-6-26.
[39]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N]. 中央日报·副刊,1944-9-6～8.
[40][41][42][43][45][63]郭沫若．屈原考[A]. 沫若文集第12卷[M].
[68]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N]. 光明日报,1951—5—12.
[69]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2]孟子．滕文公上[M].
[73]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A]. 沫若文集第15卷[M].
[80]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A]. 沫若文集第17卷[M].
[82][85]郭沫若．屈原简述[A]. 沫若文集第2卷[M].
[83]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A]. 沫若文集第12卷[M].

上接第28页

[14][17]彭明．五四运动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严复集[M].
[16]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M].
[18]郭沫若．沫若文集．反正前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